

连续三轮紧急状态 日本经济或再萧条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陈子雷

日本正在经历疫情暴发以来的第三轮紧急状态。由于疫情恶化，日本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4地4月25日起进入紧急状态，暂定持续至5月11日。

前两轮紧急状态对日本经济打击有多大？第三轮紧急状态会有什么影响？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陈子雷

1 日本疫情进入第四波

问：什么是紧急状态？日本为什么又要宣布紧急状态？现在日本的疫情有多严重？

答：日本实施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是去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案》，该法案授权日本首相可在必要情况下宣布国内实施紧急状态，以防控新冠疫情蔓延。去年年初日本新冠疫情暴发，由于当时日本政府缺乏紧急状态下实施卫生防疫的相关法案，难以采取有效防控措施。为了消除这一障碍，去年3月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全体会议通过《紧急状态法案》，授权首相可适时宣布实施紧急状态。去年4月7日，前首相安倍启动法律授权，针对疫情较为严重的东京都、神奈川县和千叶县等七个地区第一次宣布紧急状态。之后由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5月25日解除紧急状态。

今年1月8日，由于日本疫情出现反复，新任首相菅义伟不得已第二次宣布紧急状态，实施区域为东京都、神奈川县、埼玉县和千叶县等周边地区，实施之后疫情防控初显成效。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为顺利举办奥运会创造条件，日本在对疫情防控态势缺乏准确判断的情况下，过早解除部分府县的紧急状态，致使疫情再次出现反复。在此情形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针对东京都、大阪府、宫城县和冲绳县等10个疫情重灾区的部

分区域实施仅次于紧急状态的“蔓延防止重点措施”，但收效并不理想，菅义伟也因在关键时刻的误判而饱受各界人士诟病。

3月起，日本确诊病例开始持续增加，4月21日至23日连续3天新增病例超过5000例。同时，大阪府和兵库县等地医院开始出现医疗资源枯竭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传染性强的变异病毒感染病例也在迅猛增加，已占大阪府和兵库县确诊病例的80%，在东京都也升至30%，并呈继续上升趋势。应该说，目前日本疫情已进入第四波，如果得不到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在此紧急情况下，菅义伟4月23日晚宣布对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兵库县4地实施紧急状态，期限暂定为4月25日至5月11日，并将爱媛县纳入“蔓延防止等重点措施”地区。至此，日本政府已经第三次宣布紧急状态。

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日本政府要求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公司等机构尽量将居家办公人员扩大到70%，大型商业设施、提供酒类的餐厅等停业，体育比赛等大型活动原则上不能有现场观众。为防止商业街出现大规模“倒闭潮”，避免个体经营者出现“失业潮”，日本政府承诺将拨款对停业和缩短营业时间的店铺提供财政补贴，帮助它们渡过难关。

2 经济受冲击再次下滑

问：前两轮紧急状态对日本经济打击有多大？日本经济现状如何？

答：疫情反复致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连续实施紧急状态，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疫情暴发前对2020年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推算为0.7%，2021年度为0.5%，但在疫情暴发后即将2020年度增长率下调至-5.8%。而根据日本内閣府发布的数据，2020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4.8%，为1955年有统计以来第二大年度降幅。其中，占日本经济比重近七成的个人消费下降5.9%，企业设备投资下降5.8%，住

宅投资下降7.1%，出口下降12.3%。总体来说，内需拖累去年日本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外需拖累经济增长1.0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日本经济降幅在发达国家中还是比较偏低。特别是去年第一轮紧急状态解除后，日本经济第三季度开始反弹，并实现按年率计算22.7%的增幅，第四季度也随之实现环比3.0%的增长，按年率计算增幅为12.7%。但是，由于去年11月后日本疫情重现蔓延态势，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缓慢，因此第四季度仍然缺乏应有的增长动力。

基于去年年底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以及对日本疫情得到管控的

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2021年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将实现3.1%增长。日本央行报告认为将实现3.6%增长，日本政府的预测也很乐观，认为2021财年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有望实现4%增长。

但是，进入今年以来，由于防控措施不到位，疫情再次蔓延，日本首相菅义伟不得不宣布实施第二次紧急状态，使经济再次受到冲击。虽然眼下日本政府尚未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但是日本共同社1月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109家主要企业中，约17%认为日本经济将“维持现状”，约73%认为日本经济与疫情暴发前的去年1月相比处于“下滑”和“缓慢下滑”阶段。可以看出，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再次下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3 结构性问题急待解决

问：第三轮紧急状态对日本经济会有什么影响？

答：首先，疫情的持续反复正在使日本经济丧失增长动力。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冲击产生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一是使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1%降至2019年的0.57%，今年则推算为负增长。潜在经济增长率是一国在各种资源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如潜在经济增长率为负，说明经济已失去增长动力，需要对供给侧采取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经济将进入持续负增长轨道。二是日本公共债务的GDP占比由230%迅速上升至260%，居发达国家之首。公共债务的膨胀意味着将加重下一代人的税负，影响消费和投资走向。

日本社会已经步入少子化老龄化时代，未来经济运行必将遭遇劳动人口减少、内需低迷、社保透支加重财政负担和公共债务GDP占比居高不下等结构性问题。而疫情下产生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和公共债务急剧膨胀的现象，将进一步

挤压经济增长空间，使经济结构上的缺陷更加严重。因此，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制定长期有效的经济政策来解决以上结构性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给解决这些问题创造良好的条件，又需要在短期实现保增长、保就业和保民生的政策目标，这也是结构性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其次，第三轮紧急状态实施对日本经济带来的冲击不会更小只会更大。2019年第三季度后日本经济运行状态一直不理想，特别是外生变量对日本经济周期的冲击比较大。如2019年10月起日本实行消费税率上调计划，使日本经济转向下行通道。进入2020年后，各界普遍预期日本将成功控制疫情，经济会有所反弹。但事实令人大跌眼镜，防疫失控彻底压垮了日本经济。因此，根据以往经验，第三轮紧急状态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影响已显而易见。日本只有尽快控制住疫情，才能轻装上阵，重振经济。

第三，现在日本经济面临的一大离奇现象——财政货币化已成为

欧美等发达国家经济中的通病。可以说，财政货币化现象是财政透支导致公共债务膨胀和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并存的必然结果，日本和美国开始成为发达国家中的“领跑者”。美国前财长萨默斯2019年年底称：“现在对欧洲和日本可靠的市场预期使它们陷入货币经济学的‘黑洞’，即利率困在零的水平动弹不得。收益率保持为零或负值可能将持续一代人的时间，美国距离加入它们只有一次衰退之遥。”

在此背景下，曾受人讥笑的现代货币理论学派观点受到追捧。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奥布莱恩曾针对这一趋势说道：“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国家，世界经济正转向日本模式。”

但笔者认为，奥布莱恩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尽管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国家并不能代表世界经济。出现上述现象的根本，是它们经济结构性的缺陷。因此，如果疫情继续得不到控制，日本的财政货币化现象会变得愈发严重，届时日本或将出现实体经济分崩离析、资本市场“高歌猛进”等离奇现象。

巴西官员的“失言艺术”：疫情越重言论越出位



万戴 拉美问题学者、中国拉美学会理事

世卫组织4月30日召开美洲疫情发布会，美洲上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约140万例。就在此前一天，巴西累计死亡病例超过40万例。而在这个时候，某些巴西政客却忙着对出手相救的中国泼脏水。

部长“失言”自称“误会”

4月27日，在巴西参议院疫情调查委员会会议上，巴西经济部长格德斯突然发表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言论，称新冠病毒是“中国发明”，“中国科兴公司的克尔来福新冠疫苗与美国辉瑞疫苗相比效果不佳”。

在得知会议视频在社交媒体播出后，格德斯要求将视频删除。然而为时已晚，他的这轮毫无来由的指控已经被译成各国语言，在全世界多个媒体网站传播，引起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

格德斯自知“失言”，在随后的采访中表示“只是误会”，并非指责病毒是中国“发明”，而是想强调“新冠病毒在中国首次出现”；并非诋毁中国疫苗，只是想说明美国公司也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疫苗。

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公布了一组数据：中国是为巴西提供疫苗和疫苗原液的主要供应国，占巴西总接收量的95%，足以覆盖巴西紧急需求的六成；科兴公司与巴西布坦坦研究所合作研发的克尔来福疫苗占巴西疫苗接种数量的84%。

4月29日，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发言人表示：“在中国竭尽全力、克服苦难向巴西提供疫苗和疫苗原液的情况下，巴西政府高级官员发表这样的言论有悖于双方为双边合作

营造良好气氛的意愿，违背事实。”巴西新任外长弗兰萨就此事与中国沟通，并表示格德斯的言论“没有损伤巴中关系”，两国依然致力于“携手早日战胜疫情”。

缺乏常识与责任心

格德斯莫名其妙的说辞，并非疫情暴发以来巴西高级官员首次“失言”。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众议员爱德华多曾在社交平台发表有关中国的不恰当言论；前任外长与教育部长曾以出位言论攻击中国；博索纳罗也曾表示拒绝购买中国疫苗，后来又改变态度。

细看格德斯的言论，不仅对同巴西合作抗疫的中国造成伤害，在事实上更难以服众：病毒溯源问题是科学共同体协力进行的研究行为，且世卫组织早已排除“制造病毒”的可能。将病毒溯源政治化，在国际舆论界都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时至今日依然持类似说法，不只是缺乏常识，更是缺乏责任心。

而格德斯口中有着“百年研究史”的美国辉瑞疫苗，直到巴西新冠死亡人数突破40万之际，才刚刚在4月底运抵巴西。倒是遭他贬低的“中国疫苗”，才是巴西政府批准且购得的两款疫苗中的主力军。而格德斯本人在发表不当言论的前两天，刚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第二针。

蕴含政治投机底色

疫情越严重，言论越出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巴西某些官员的标准化操作，其中蕴含了更多政治投机的底色。这种投机既包含国际政治领域的利益谋划，也可能带有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刻意引导。

作为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弟子”，格德斯笃信新自由主义改革。就任经济部长之初，他就希望强力推动私有化改革，并降低福利水平，以保障经济平稳运行。这一点与总统博索纳罗的政治承诺相悖，因此并没有得到真正推行。在4月27日会议中他再次表示，由于缺

乏实现能力，巴西应该降低公共服务投入，由私营经济入场主导。

纵观整个会议发言，格德斯对中国的言论，只是他在表述政治企图时强拉出的“例证”。为了彰显自己经济主张的正确性，他轻易地批评自身知识与职权范围之外的事物，没有估量可能对国内抗疫造成的影响，更不顾同胞的健康与安全。世卫组织在4月30日发布会上表示，巴西疫情已暂别最高峰，出现缓解态势。这无疑是对所有助力巴西抗疫的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肯定，其中也包括中国疫苗为巴西人民打造的安全屏障。

但必须要看到，疫情的缓和建立在超过1400万人确诊和40万人死亡的超高数据之上。作为一个国家各领域的具体决策者，重视来自各方的善意和协助、尽最大努力保护国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人是目的，生命是前提，不能成为少数精英政治棋盘上的棋子。